

屈原人生轨迹的医学考量

☆ 浙江温州 陈德春

屈原,本名正则,字灵均。又名平,字原,后儒尊之为屈子。屈原生卒,众说纷纭。本文拟就其履历,分为任职前、从政期、放逐后3个生活片段,从医学角度考量屈原的人生轨迹。

忠孝两全的爱国情怀

根据屈原自叙以及后人的考证,公元前339年屈原出生在楚国(今湖北省秭归县)。他的始祖是五帝之一的颧项高阳氏之“苗裔”,与楚王同氏——芈,是楚国王族三大姓(昭、屈、景)之一。因此,对于屈原而言,尽忠亦即是尽孝,爱国亦即是爱族。使屈原走向忠孝两全的人臣之路。

出身于帝胄、贵族之家的屈原,自童蒙伊始,便有了优于常人的心理暗示。其父伯庸喜屈原降生于特殊美好的日子里,气度非凡,乃谨遵卦兆赐之以“嘉名”,希望于屈原能够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。是以从小严格施教,及长转益多师,让屈原诣昭府见习、读书、抄写。后来,屈原又得到隐士馈赠以一大袋竹筒,使其知识日益渊博。如他自己所谓: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。”表明了他对与生俱来的客观“内美”,通过自己的主观“修能”,为完善自己的人格充满自信。

美国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家戴维·迈尔斯说:“人类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的产物……外在的社会影响力塑造着我们的态度和行为。”屈原正是在这种先天的、社会的心理自我暗示下,凭借着暗示的强大潜力,自觉修养,臻于完美。基于他的父祖叔伯们都曾在楚国担任要职,可以想见,其儿时的生活是在“钟鸣鼎食之家,翰墨诗书之族”中度过的。所以,他有条件设计奇服、制作奇服,并长期穿着奇服;他有条件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仪表与言行举止,以示尊贵;他有条件在修文的同时又兼习武艺,而佩剑终生。总之,由于他自幼经过严格的训练,形成了一种习惯,在其出任任职之前即已彰显了他是一位文武全才、仪表堂堂的公子王孙。

哲学家和教育家、英国弗朗西斯·培根说:“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,它可以主宰人生。因此,人自幼就应通过完美的教育,去建立一种好的习惯。”这样的说法佐证了两千多年前屈原父子的做法是正确的。同样,戴维·迈尔斯的说法,也印证了屈原当年的做法是合理的。他说:“我们的文化有助于定义我们的情境。我们对机敏、坦诚和着装的标准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。”屈



原的家庭文化背景,敦促了他对道德品质的苛刻要求,助长了他对着装标准的独特爱好,也成全了他的行为习惯和人格趋向。

屈原的生活背景决定了他的生活情境:为了孝,他必须爱族;为了忠,他必须爱国。所以,在他担当社会角色之前,他的人格就已基本定型——他服饰整洁,仪表端庄,步履稳重;事无巨细,循规蹈矩;忠于宗国,憧憬“美政”;敢于改革,责任心强。而且毕生追求精益求精,凡事讲究至善至美。诚如东汉王逸所说,屈原乃“膺忠贞之质,体清洁之性,直若砥矢,言若丹青,进不隐其谋,退不顾其命,此诚绝世之行、俊彦之英也”。这些足以说明,屈原是一位千真万确、不折不扣的坚持原则、注重道德的完美主义者,这种完美主义的追求对其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恩怨纠缠的君臣情结

屈原20岁左右出任三闾大夫,翌年晋升为左徒。前者除管理王族谱牒外,具体负责昭、屈、景三姓王室子弟的教育工作,相当于贵族学校的教育长官,着力培养关心民瘼的执政党人。他的施教蓝图是栽培一批批兰心蕙质般的帝胄弟子,正如其在《离骚》中言: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,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

衡与芳芷。”并殷切地盼望着有所收获——“冀枝叶之峻茂兮,愿俟时乎吾将刈。”

遗憾的是,不久屈原即被调进庙堂,担任左徒,与楚怀王亲密相处,成为楚国政治核心仅次于令尹的第三号人物。奉命制定宪令,初见成效以后,遭到了以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竭力反对,这是内政。在外交方面,时值战国七雄纷争,合纵连横,时局变幻。屈原主张联齐抗秦,亦初见成效,同样遭到靳尚之流的忌恨。

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:“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性格。”屈原被逐以后,犹一再表达了“愿陈情以白行”的思君念国,以及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执著精神和“伏清白以死直”的崇高气节,诠释了屈原自始至终对宗国的不离不弃、对“美政”蓝图的坚定信念。

此时屈原,对楚怀王是感恩中杂糅着几分怨怼的。从“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,到后来“数惟荪之多怒兮”“君含怒而待臣兮”“惜壅君之不昭”,忤其措辞,虽怨声逐步升级,但尚不失贞臣节操。

此时屈原,对那些“贪婪”“怨己”“追逐”的狡黠佞人,则敬而远之。唯对楚怀王仍抱一线希冀。到后来,怀王入秦,顷襄王继任,为了美政,屈原

犹抱一丝奢望,孰料令尹子兰,联合顷襄王放逐屈原,令屈原惟恐重遭小人排斥。

其实,起初鼓励屈原改革并商讨制定新法令的楚怀王之所以半途而废,是有人类之劣根性与社会根源的。弗·培根在《人生论·论革新》中指出:“既成的事物,即使并不优良,也会因已被习惯所适应而生存;新事物,即使更优良,也会因不适应于旧的习惯而受到抵制。”他又说:“社会改革难免触犯既得利益……而受损者则必然要诅咒那些改革的发起者。”所以屈原之被孤立是可想而知的。比照之前商鞅、其后王安石、乃至康梁变法,都无不因此而失败。

历数屈原任职,含二度使齐,前后不过十年。君之与臣,由重用到疏远,进而被谪,恩怨交加;僚属之间,怀恨者多,同声者少。迨楚顷襄王朝,“又遭子兰算计”。此后屈原,远离政坛。恩怨纠缠的君臣情结正是屈原人生轨迹在医学上的反映。

进退维谷的彭咸情愫

纵览屈原的下半生,因有过风光,为了理想,目睹现实,自难释怀,故昼夜沉浸于苦楚之中。这期间,他也有过心理博弈。如:“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,忍而不能舍也!”尽管现实是“使谗谀而日得”,他犹不愿看到“使芳草为薜幽”。甚至连其姐质问:“世并举而好朋兮,夫何载独而不予听?”他也无动于衷。虽有“任重石之何益”?但最终还是“吾将从彭咸之所居”!这坚持,这情境,便是贯穿屈原一生的人格魅力。

这期间,他也有过进退维谷,因为“竭忠诚以事君兮,反离群而赘疣”,所以萌发了“退静默而莫余知兮,进号呼又莫吾闻”的感慨。他也有“欲高飞而远集兮”,或“欲变节以从俗”,或“恬死亡而不聊”,却都因“志坚而不忍”。屈原,心潮起落!“背膺脾以交痛兮,心郁结而纡轸。”屈原,心力交瘁!这犹豫,导致了屈原郁郁寡欢。久而久之,使屈原产生了情感性障碍,产生了完美型人格的侧翼思想——愤世嫉俗。这,在他的作品里,随处可见,最突出的是其作品《天问》提出了170多个悬念。这,只是非精神科的心理行为。所以,其作品被誉为独步骚坛的中外绝唱!

即便在《天问》篇中,三百七十四句,率皆言有所本、事实可核、义理能明,自始至终蕴藉着屈原对宗国的赤子之心。他将力谏商王无果愤而投水的彭咸视为偶像以后,一次又一次地类似表示——“愿依

彭咸之遗则!”于倾诉衷肠的同时,犹不忘搜集民间歌谣,创作了《九歌》,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喟和爱国情操。即便在被谪被逐,孤苦零丁,他也永不从俗而失节,效忠宗国,乃至生命终止。即便在决定以死警世,他也不忘表白——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”,倾诉了不能实现“美政”的理想是他选择自沉的真实原因。即便在他面临死亡,由于“暨志介而不忘”,犹身著奇服,特立独行,勇追前贤。

总而言之,屈原被逐,虽孤独郁闷,却赢得了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时间。亚里士多德说:“幸福存在于闲暇中。”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法国思想家罗曼·罗兰说:“人生只有一个朋友,而且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才有——这就是孤独。”我国安希孟在其《孤独的哲学》里也说:“诗人是苦闷的,哲人是孤独的。苦闷因孤独而生发,孤独借苦闷而增益。”

屈原是一位先知先觉者,既是哲人,又是诗人。当他“美政”宿愿破灭以后,心不甘,志未泯,愤世嫉俗,乃以其完美人格如火山般喷射出他的文学光焰。诚如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所谓:“若人生而具备某些可以为他使用的才华,他的最大幸福便在于使用这些才华。”哲人不幸诗学幸。终于造就了屈原走向世界文学的巅峰!

屈原沉沦半生,心情抑郁,作品则超凡脱俗。观其品行,思考问题透彻,对情感的体验深刻、有力而持久,但他不愿拘泥于固有的观念,常能以新的想法创造新的作为,注意稳定而难于转移,知识渊博而话题丰富;观其行事,在政治上,他是社会改革家、“美政”蓝图的执行官;在文学上,他是大胆创新的诗人,由四言诗到七言,而骈文,而赋体。

综观屈原的心理特征,隶属于非精神科范畴的抑郁质,所以不影响他的人格完美和他的文艺成就。相反地,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:“所有在哲学、政治、诗或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人士都具备忧郁的气质。”至于屈原为什么要采取“沉渊”来结束自己的生命,或许是他觉得选择自杀在形式和时间上有相对的自由和随意性,不像比干剖心、伍员挖眼那么突然和苦楚。尽管他很敬重他们,因为他杀毕竟太残忍、太被动。所以,一代伟人,效法彭咸,选择适时自杀,以死明志。这,反映出其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质。